

中苏建国初期国情之比较

●任超阳

[摘要]十月革命后苏俄的建立,打破了资本主义一统天下的局面。新中国的成立,使占世界近四分之一人口的大国走上了社会主义道路。苏俄和新中国都是从封建性的社会走向人民当家作主的社会,两者在建国初期面临着相同的任务,但是两国的基本国情却并不完全相同。本文以中苏两国建国的国情为基点,从经济条件、政治环境、民族传统、外交关系几个方面比较其异同,侧重点在于中国与苏俄的不同之处,旨在说明不仅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而且要根据各国不同的国情采取不同的政策和办法,走一条适合本国建设的特色之路。今年是苏联解体20周年,但我们党在辉煌与稳定发展中迎来建党90周年,抚今追昔,我们要吸取苏联解体的经验教训,建设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关键词]中苏;建国初期;国情;比较

[中图分类号]K15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2254(2011)18—043—03

在俄国布尔什维克党的领导下,俄国人民经过二月革命、十月革命推翻了沙皇俄国的专制制度和资产阶级临时政府,在世界上建立了第一个以工人阶级为领导阶级的社会主义国家。30年之后,在东方的文明古国,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人民经过长期的浴血奋战,最终选择了社会主义。社会主义同任何新生事物一样具有旺盛的生命力和辉煌前景,但是其发展道路又是坎坷曲折的。由于种种原因,在上世纪90年代初,苏联、东欧发生剧变。曾经作为社会主义“老大哥”的苏联已经不复存在,但中国在坚持社会主义的前提下不断进行改革已取得显著成效。强大的苏联为什么瞬间解体?中国如何才能能在社会主义道路上取得更大的发展?笔者认为可以从中苏两国最基本的国情入手,探讨两者的异同,希望为解决上述问题提供一点思路。

首先,有必要对中国、苏俄“建国初期”进行时间限定,以增加两者的可比性。笔者认为,苏俄经过战时共产主义到1921年开始了实施新经济政策,即向社会主义过渡时期政策;中国经过三年恢复时期于1952年底提出了社会主义过渡时期总路线,可以把1917年十月革命之后到1921年实行新经济政策之前作为苏俄建国初期,而中国的建国初期则可以界定为从1949年新中国的成立到1952年实行过渡时期总路线这三年时间。

一、苏俄建国初期的基本国情

20世纪初,俄国无产阶级和广大群众发动了反对沙皇专制的斗争,由于当时无产阶级政党建立不久,还没有形成统一的能够指挥协调全国的领导力量,没有和农民结成巩固的联盟,最后以失败告终。但从1917年1月起,俄国各

地的工人群众又积极响应布尔什维克党的号召,举行政治罢工和斗争,遭到了沙皇政府的镇压,不得不采取武装斗争的形式,资产阶级为了夺取政权,也成立了“临时委员会”,宣布接管政权。在工人阶级的斗争下,俄国末代沙皇签署了退位诏书,但二月革命推翻了沙皇专制后却出现了“两个政权并存”的局面,即以临时政府为代表的资产阶级专政和以工兵苏维埃为代表的工农政权并存。资产阶级政府为了维护既得利益,不仅没有解决人民群众关心的和平、土地等问题,反而准备让末代沙皇的弟弟继位,同时还镇压了群众的示威游行运动。在发生了“七月流血事件”后,以列宁为首的布尔什维克党得到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决定以武装形式夺取政权,并最终取得了十月革命的胜利,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开辟了人类历史的新纪元。

新建立的苏俄,不仅四面受敌,而且发展也面临种种困难。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俄国仍然是一个小农占优势,封建自然经济成分占主导的国家。据莫斯科高校出版社1987年出版的《19世纪—20世纪俄国史统计》,1897年的俄国资本主义工商业较为集中的城市居民人口只占总人口的13.4%,1914年上升为17.9%,各类工人为1780万,约占总人口的11%;从俄国国民经济固定资产的构成看,1914年农业资产占53.7%,工商、交通、通讯加在一起总共才占46.3%;从国民收入构成看,农业占了53.6%,其余所有的收入占46.4%。^①当时的俄国仍是一个落后的以农业为主的国家,且农奴制残余普遍存在。这是苏俄建国前的重要国情。

苏俄建立后于1918年春签订了《不列斯特和约》,退出

了第一次世界大战,使苏维埃政权得到了短暂的和平,开始实施土地社会化、银行国有化、工人监督、大企业国有化等措施,初步建立起社会主义国有经济,改善了工农地位,巩固了新生的苏维埃政权。苏俄人民正在准备开展社会主义建设时,便发生了英、法、日等14国联合武装干涉苏俄的事件。从1918年3月开始,国外武装势力和国内反动势力相互勾结,“从四面八方发动进攻,占领了苏俄四分之三的土地,形成了对新生政权的包围,于是苏俄除了建立战时体制外,别无选择”。^[2]

苏俄政权为了应付战争,采取了以下措施:第一,实行余粮收集制。第二,实行广泛的工业国有化和工业管理集中制。工业管理和计划集中于最高经济委员会各部门的总管理局。第三,限制市场流通和私人贸易。尽管国内贸易国有化法令只规定对经营国家垄断品的私人商业实行国有化,但在实际过程中几乎所有的私人商业都国有化了。经济关系迅速实物化,按阶级属性确定口粮标准,工业必需品实行配给制,进行大规模的实物交换。第四,为了保证前线的胜利和工厂劳动力的供给,实行了劳动义务制和劳动“军事化”,只有完成了一定劳动义务,才能领取到相应的口粮。苏俄建国初期的建设是在落后、封建性农奴制残余普遍存在,农民占80%,文盲约占全国70%的人口的基础上,在战争和动荡的环境中进行的。战时共产主义政策不仅保证了红军的给养,而且建立了工农国家对国民经济的全面有力的领导,打击了城乡资产阶级的抵抗和投机活动,保障了全国人民的物质生活需要。但它毕竟是作为一项应急措施出现的,脱离了落后国家的客观现实,脱离了广大农民的需要,随即被新经济政策取代。

二、中国建国初期的国情

中国人民在经历了资产阶级领导的旧民主革命和农民领导的农民革命均遭失败的情形下选择了中国共产党。在经历了反对帝国主义列强的战争、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后,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1949年9月新政协会议的召开和1949年10月1日新中国的成立,并以政协签署的《共同纲领》作为临时宪法,开创了历史发展的新时代。

建国初期,帝国主义的战争威胁依然存在,特别是美帝国主义对中国人民的胜利表示极端的仇视和恐惧,在政治上采取不承认政策,在经济上实行封锁禁运,并利用国民党残余势力进行各种破坏和扰乱,妄图扼杀新中国。在国内政治方面,国民党反动派残余武装以及其在溃退时残留在大陆的200万政治土匪、100万特务分子和反革命势力还在进行破坏、暗杀和暴乱,严重威胁着国家和人民的安全。经济方面,工农业极端落后。全国钢产量只有15.8万吨,比历史最高年产量1943年的92.8万吨下降了383%;铁产量只有25.2万吨,比历史最高年产量1943年的180万吨下降了86.4%;煤产量3090万吨,比历史最高年产量1942年

的6100万吨下降了49.9%;电力43亿度,比历史最高年产量1941年的60亿度下降了27.7%;棉布3000万匹,比历史最高年产量1936年的4500万匹下降了32.9%;全国铁路破坏将近一半,能通车的仅11000公里;全国粮食产量比历史最高年产量1936年的2700亿斤下降了25%;棉花减少一半,加上无力抗拒自然灾害,1949年全国受灾面积达12000万亩,灾民约4000万人。^[3]再加上国民党政府长期滥发纸币,通货膨胀,致使物价飞涨,物资奇缺,工厂停工减产,到处可见失业群众和流落灾民,经济困难巨大。

面临以上困难,建国初期的中国基本任务是完成民主革命遗留任务,巩固新生政权,领导全国人民进行生产建设,改善人民生活。第一是要建立各级人民政权。建国第一年,全国行政区划分为28个省、3个直辖市、8个行署区、1个自治区(内蒙古)等,并号召召开人民代表大会,至1951年9月,全国已有98.5%的县召开了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是建立国营经济。除了原有的解放区公营经济外,主要是通过没收官僚资本,征用外国在华企业建立起来的。党中央指示,接收官僚资本的企业,并不打乱原来的技术组织和生产管理,先保证生产再进行民主改革。第三是镇压反革命,基本肃清了三大敌人在我国大陆的反革命残余势力,使我国社会秩序得到了初步安定。第四是开展土地改革。依靠贫农、雇农,团结中农,中立富农,有步骤有区别地消灭封建剥削制度,发展农业生产。第五是抗美援朝。美帝国主义长久以来一直蓄谋通过侵占朝鲜,进而侵占中国。美国于1950年6月25日发动朝鲜战争并武装侵占我国领土台湾。中国共产党清醒地估计了当时的形势,为了保家卫国和保卫和平反对侵略,派遣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与朝鲜人民军并肩作战。抗美援朝提高了中国的国际地位,也得到了世界上爱好和平国家的支持,这有利于国内经济的恢复和发展。

经过三年的国民经济恢复和发展,巩固了新生政权,人民生活得到了很大改善,全国职工年平均工资1952年已达446元,比1949年增加了70%左右,全国农民每户收入1952年比1949年增长了30%以上,统一了全国财政,稳定了物价,为社会主义改造奠定了基础。^[4]

三、中国苏俄两国建国初期的国情比较

中国苏俄两个社会主义大国的建立,对世界产生了不可估量的影响。两国的经济、政治等有着相同的部分,也存在很大的差异。对于两国建国初期的国情,笔者认为可以从经济条件、政治环境、民族传统、外交关系几个方面进行较。

第一,从经济条件来说,建国初期的苏俄和中国都面临经济困难。尽管俄国在1861年改革后资本主义有所发展,但总的来说,苏俄和中国基本上都是由封建制度迈向社会主义。两国农业产值均占全国总产值的大部分,农村人口均占全国人口的80%以上,且文盲人口比重大。由于

沙皇俄国和中国晚清政府以及国民党的腐朽统治,加上战争的破坏,建国初期两国经济秩序混乱、物资奇缺、物价飞涨、通货膨胀率高、货币贬值。苏俄采取了战时共产主义,建立了国有工业,中国也接收了官僚资产,建立了国营经济。但是,中国的官僚资本更为集中,不仅控制着轻重工业,而且有国民政府的“四行二局一库”(中央银行、中国银行、交通银行、中国农业银行、中央信托局、邮政储金汇业局、中央合作金库)控制着全国的金融。新生政权接管了官僚资本,基本上奠定了强大的国营经济基础。中国接收官僚资本的一个显著特点是把官僚资本完整地接收下来,先实行监督生产,再逐步实行民主改革和生产改革,基本上保证了生产的连续进行并使原来企业中的工程技术人员和管理人员基本上都保留下来,继续为生产服务。

第二,从政治环境来看,新生的苏俄和中国都面临着战争的威胁和其他帝国主义国家的敌视,总的来说是政治环境极不稳定。在苏俄,1918年春,14个帝国主义国家联合对苏俄进行武装干涉,并勾结本国反动势力,形成了对新生政权的包围,形势极其严峻,关系到新生政权的存亡。由于苏俄是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除了存在72天的巴黎公社的一些经验之外,其余全靠在本国的实践中摸索。列宁认真分析了苏俄的国情,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应用到俄国革命的实践中,成功打败了帝国主义的武装干涉,巩固了新生政权。但是苏俄当时的一些政策是应付战事,还不能作为直接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措施,必须对本国国情加以分析,结合实际,制定正确的政策和路线。新中国成立初期,西南地区以及一些岛屿尚未解放外,在广大解放区,主要任务是消灭土匪和特务分子以及国民党残余,这是局部的战争,没有爆发全国战争,且在大陆范围内没有与帝国主义的战争。总之,建国初期的苏俄政治局势十分严峻,中国则由于特务分子的破坏多有伪装,斗争也极其艰难。

第三,从民族传统因素来看,苏俄和中国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苏俄有100多个民族。从公元882年建立基辅罗斯公国到1261年建立莫斯科公国,俄国的政治形式一般以某个城堡为中心,包括周围一些地方和地区。沙皇俄国“似乎有一种扩张领土的嗜好,为了扩疆增土,并用各种手段”。^[5]沙皇俄国的疯狂扩张,却忽视统治,只要求扩张后领土的统治者臣服纳贡即可,各个政权之间相互独立,民族关系也相对独立。而在中国,56个民族之间融合交流较多,特别是统一的思想深入人心。早在1945年,内蒙古自治区就已经成立。新中国成立后,根据内蒙古自治区的成功经验,决定在少数民族聚集的地区,实行民族区域自治。1952年8月8日,中央人民政府批准公布《民族区域自治实施纲要》。因为占全国人口不到10%的少数民族群众,居住地区广大,占全国土地面积的50%到60%,所以新中国不仅有自治区,还有自治州、自治县等;到1953年3月,县及县

以上的自治区达47个,自治区内少数民族人口达1000万人。^[6]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是中国共产党在处理民族问题上的一个创举,成为全世界正确处理民族关系的典范。

第四,在国际环境方面,新生的苏俄作为唯一的社会主义国家出现,开创了历史发展的新纪元。但是资本主义国家联合对苏俄进行武装干涉,公然发动战争。1918年苏俄退出了沙皇俄国参加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并且积极同受帝国主义压迫剥削的国家取得联系,支持世界无产阶级的革命。苏俄成立后就曾支持中国的革命,并主动废除了一些侵略中国的不平等条约。新中国成立时也遭到帝国主义的仇视,特别是美帝国主义对中国实行经济封锁、禁运等,并企图通过侵占朝鲜而侵略中国,还操纵联合国阻挠恢复中国在联合国及其所属机构中的合法代表席位。但是中国并不是孤立无援的,新中国成立的第二天,苏联政府首先照会中国政府,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并与其建立外交关系。1949年10月16日,苏联首任驻华大使罗申向毛泽东递交国书,中国派王稼祥为首任驻苏大使。另外,新中国建立时,全世界都在进行轰轰烈烈的民族解放运动。随苏联之后,保加利亚、罗马尼亚、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波兰、印度、丹麦、瑞典、印度尼西亚等国相继承认新中国并建立了外交关系;英国、挪威、荷兰、芬兰等国同我国进行建交谈判。^[7]此外,我国还与许多国家恢复和发展了通商贸易关系及人民的友好往来。

中国、苏俄两国的基本国情有所不同,其所采取的措施也必然有所差异,不能以简单的对错划分,但有两条基本原则必须遵守:一是正确理解和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并坚持马克思主义;二是根据实际情况制定正确的政策、方针以利于本国经济、政治和文化的发展。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曾经作为世界第二强国的苏联已经宣告解体,作为后起者中国却展现了勃勃的发展生机,因此,我们要从苏联的失败中汲取教训,总结经验,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展现出更强大的发展前景。

注释:

[1]陆南泉、姜长斌等主编:《苏联兴亡史论》,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151页。

[2]高放、李景治、蒲国良主编:《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与实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144页。

[3][4][6][7]李茂盛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1年,第30-31、63、34、75页。

[5]白建才著:《俄罗斯帝国》,三秦出版社,2000年,前言第3页。

(本文作者 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 北京 100872)